

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 ——《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

张佳佳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元明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仕进的隐士群体。按照传统观念, 明初皇权的强化以及对士人的严厉打压, 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隐逸诗人邓伯言《玉笥集》的个案讨论, 试图指出: 隐逸基本上是文人儒士元代生活状态在明初的延续; 元代以来士人由入世到出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 是形成元明之际隐逸风尚的主因, 而明初政治环境的严厉化以及士大夫的遗民情绪, 只是加剧了这种风气。

[关键词] 元明之际 士大夫 隐逸

朝代更迭之际文人士大夫的心态, 历来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宋元易代和明清鼎革之际的士林风貌, 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细致的研究; 相形之下, 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却显得较为黯淡。传统的政治史论述集中于明初皇权专制的加强, 士大夫只被当作专制的牺牲品附带提及。论者多从以士人地位低落来论证皇权强化的角度, 罗列文人罹祸的事例, 作一些概括性的描述, 很少对元明之际士大夫的心态与风貌, 作正面的专门研究。^①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有关明初士大夫政治心态的个案讨论, 基本上集中于杨维桢、戴良、高启等上层江浙文人,^②难以全面地反映中下层士人的普遍风貌。本文试图通过明初临江隐士邓伯言的诗集, 对元明之际士人的价值取向与政治认同作具体的个案研究。以诗集为材料论述历史, 自然有相当的难度: 由于体裁的限制, 诗歌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往往有限; 写作背景的缺失与诗歌语言的含蓄, 又容易使对诗歌的解读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为此, 笔者将尽量勾稽与诗文相关的背景旁证, 尽可能避免在阐释上出现郢书燕说的差失。

一、邓伯言和《玉笥集》

邓伯言(1338—1389后), 名雅, 临江府新淦县(今江西新干)人, 元末明初的诗人、塾师和当时为数众多的征士、隐士中的一员。除去方志里的一条简短介绍, 以及稗史中与他有关的一则笑料, 邓伯言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其他痕迹。有关他的生平, 只能从诗集里窥见大概。

邓伯言的家乡临江, 地处元明两代文风极盛的江右地区, 北依南昌、东邻抚州, 下辖清江、新喻

[收稿日期] 2008-09-22

[作者简介] 张佳佳,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 ①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是笔者所见到的有关元明之际士大夫心态最早的正面研究, 钱穆先生在文中提出的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林丽月教授承钱先生之余绪, 撰有《读〈海桑集〉》讨论儒士陈谟在元明之际的出处, 可参见《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 台大历史系, 1996年, 第149页。
- ② 有关方面的研究, 可以参看晏选军: 《戴良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黄仁生: 《论杨维桢的政治态度》《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吴士勇: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刘祥光的《从徽州文人的隐与仕看元末明初的忠节与隐逸》从郑五、赵汸等人为例, 探讨了徽州士人在元明之际的仕隐观念, 《大陆杂志》第94卷第1期。另外, 唐朝晖对明初区域性遗民群体有所关注, 参看氏著: 《元婺州遗民诗人群体及其文化特征》《求索》2004年第7期; 《元海北广东道遗民诗人群考论》《湖南商学院学报》第13卷第4期(2006年8月)。

和新淦三县。^① 新淦位于临江府南部，南接吉安。邓氏宗族在新淦不算显赫，方志中没有邓氏家族成员取得功名的记录；从邓伯言的诗集里我们仅知道他有两名同族的远亲，在明初担任过虞衡、王府典宝之类的小官。^② 诗人早年经历比较坎坷，八岁失怙，由母亲抚育成人。^③ 从《玉笥集》中不少充溢着理学观念的诗作来看，诗人年轻时受过较好的理学教育。^④ 当然，这也可能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临江东邻的抚州，理学风气极盛，在宋元两代出现过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和吴澄。邓伯言壮年适值元末的大乱，临江地区大约有十二三年的时间处于动荡之中。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攻陷临江，地方上开始陷入动荡；^⑤ 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攻陷临江北面的龙兴路；至正二十二年（1362），陈友谅与朱元璋的部队又在临江北邻的南昌数度激战，^⑥ 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地方秩序才渐趋稳定。从《客馆岁暮别友人》、《喜雨示诸生》、《客馆辞归》等诗来看，^⑦ 为了避乱与谋生，邓伯言曾长期在新淦附近地区教授生徒。可能正是这种四处教馆的生活，使他结识了新喻、永丰、乐安等周边县区的许多文人隐士，诗集中有不少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诗人晚年丧妻，境况较为惨淡，洪武十五年（1382）之后，依附地方大族黎氏，居住在黎氏家族的沧州，可能直至去世。^⑧

邓伯言曾经一度在新淦、永丰交界的玉笥山，筑群玉山房隐居，自号“群玉山人”。^⑨ 玉笥山旧称群玉山，是道教“第十七洞天、第八福地”，^⑩ 邓伯言的《玉笥集》即以隐居地命名。根据诗集的序文，本书最终定稿于洪武二十二年，由作者的好友黎季敏鸠工刊刻。^⑪ 本集后世传本极少，《四库提要》谓“此集诸家书目亦未著录，惟此抄帙流传，仅存至今耳”，^⑫ 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有洪武二十二年所刻十卷本，^⑬ 今已不可见。今天能见到的只有两个九卷本，其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另一个是铁琴铜剑楼旧藏清钞本。^⑭ 对勘之后可以发现，两种《玉笥集》实际源于同一个版本系统，而四库本较为优胜。邓伯言这样一位罕为人知的地方诗人，他的诗集能被收入《四库全书》，不仅因为诗歌“格调平正”、“气味冲淡”，更因为作者“辞荣名而就有道”，屡辞明政府的征辟，能够保全遗民的志节，“志操亦颇有可观者”。^⑮ 在乾隆皇帝大倡“气节”、贬斥“贰臣”的时代，这种遗民隐士的身份，无疑提升了邓伯言的身价。

《玉笥集》共收录邓氏诗作五百余首，从标注的年代以及内容来推断，大部分作于入明之后，其中有大量的作品是与周边隐士群体的唱和。比较特别的是，《玉笥集》的最后一卷题为《朝京纪行》，专门记述洪武二十年左右诗人的金陵之旅。这部诗集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揭示出了元末明初临江南部地区一个庞大的隐逸群体，集中了大量的隐士唱和，以及作者对仕止进退的思考，为观察当时文人隐士的政治心态，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① 嘉靖时析新喻、新淦两县另置峡江县，故《峡江县志》中也有关于邓伯言的小传。

② 邓伯言：《玉笥集》卷四，《贺邓尚之除丰城虞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7页（本文所引《玉笥集》都以四库本为依据，后文只标明页数）；卷五《楚王府典宝邓尚忠访余，叙宗族之好，诗以赠之》，第731页。

③ 《玉笥集》卷一《柬同宗邓仲伟》，第676页。

④ 如《玉笥集》卷一《拟古九首》之一、二，第671页；《题李氏维稼堂》，第675页。

⑤ 同治《临江府志》卷十一《武事》，页9b。

⑥ 民国《南昌县志》卷五十四，页6b-8a。

⑦ 分见《玉笥集》卷一，第677、683页；卷三，第700页。

⑧ 戴正心：《玉笥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670页。

⑨ 《玉笥集》卷一《余居金川玉笥之间，以渔樵耕牧为乐，赋诗四首》，第688页；卷四《次丁御史群玉山房韵》，第718页。

⑩ 隆庆《临江府志》卷三《疆域》。

⑪ 戴正心：《玉笥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670页。

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9，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64页上。

⑬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补订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1页。

⑭ 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⑮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笥集》卷前《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667页。按，本句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二、《玉笥集》与元明之际的隐逸风尚

元明之际的士林当中，弥漫着极为浓厚的隐逸风气。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经指出，“明初文人多不仕”，^①这些不愿出仕的文人，大多遁迹于山林田野。实际上不仅是明初，元代后期士人隐逸不仕的风气就已盛行，而在元明之际达到高潮。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上出产隐士的高峰时期，只是研究者对此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单以临江地区而论，《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人物列传·隐逸》收录明初隐士五人，但《玉笥集》中收录的临江南部新喻、新淦两县以及周边郡县的隐士唱和，远远不止此数。元明之际的临江地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隐士群体，下表仅从《玉笥集》前四卷中撮举数例，以见当时隐逸风气之流行：

姓氏	籍贯	唱和诗文	备注
何幼恭	新喻(?)	朝游金陵馆，暮忆云门山。谁知轩冕荣，不及樵苏闲。 卷一《题何幼恭云门归隐图》(第673页)	
何同德	新淦	守己无外慕，养气恒内充。岩穴托冥棲，幽軒眄云松。 卷一《题何同德独善斋》(第672页)	
胡志同	南昌	征起拜龙袞，乞归吹凤匏。还将御赐笔，挂在凌云梢。 卷一《题胡志同云松巢》(第673页)	征士 ^②
陈伯玉		缅思云樵翁，心中澹无欲。恳切辞簪缨，还山养麋鹿。 卷一《寄陈伯玉征士自号云樵》(第674页)	征士
邹椿龄		大隐隐城市，小隐隐山林。所居虽异地，所乐还同心。 卷一《寄邹椿龄》(第678页)	
曾大雅	新淦	高山列屏障，下有幽栖人。 卷一《寄曾隐君大雅》(第678页)	
王彦翬		辞荣抱幽独，足以全其真。举瓢酌山月，扫石眠松云。 卷一《寄王知县彦翬》(第684页)	
娄仲实	新喻	卷一《题娄仲实继志斋》(第691页)	临江十才子之一，隐居终老。 ^③
黄九鼎	临川	周顥去北山，乃取当时讥。君为北山隐，岂蹈当时讥。 卷一《题临川黄九鼎北山清隐》(第692页)	
罗源泉	吉水	豫章先生八十余，有才不仕山林居。 卷二《奉简罗源泉》(第697页)	
周文瞻	新喻	天上辞荣日，山中养道年。闲将玉筭篆，写出白云篇。 卷三《寄周主事文瞻二首》(第700页)	
邹恒吾	新淦	卷三《题邹恒吾沧州渔隐》(第702页)	
邹幼亨	新淦	习隐犹南郭，知音似子期。不关尘世事，为录老夫诗。 卷三《幼亨为录玉笥集》(第706页)又同卷《邹幼亨以召赴京告归养亲因寄二首》	征士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41页。

② 传见同治《万载县志·寓贤》卷22页4a。

③ 传见康熙《新淦县志》卷十二《隐硕传》页24a。

(续表)

姓氏	籍贯	唱和诗文	备注
张伯温		知君隐处白云峰，俗意都无在眼中。 卷四《和张伯温秋兴三首》(第 711页)	
陈三径		先生寓隐南溪上，绝胜王维住辋川。 卷四《奉答陈三径》(第 712页)	
何克敬		渔钓昔闻周隐士，讴吟今作汉遗民。 卷四《和何克敬春行》(第 713页)	
梁寅	新喻	莫怪韬光老岩谷，几多膏馥在人间。 卷四《题梁征君石门精舍》(第 715页)	征士
徐以观	丰城	自是鹿门堪隐逸，只愁天遣使车迎。 卷四《耕乐为丰城徐以观赋》(第 719页)	

上表所列的这些隐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元代就无意仕进、屏居山野的文人，譬如罗源泉，“喜寻玉笥松云巢，懒谒金台朱紫贵”，隐居玉笥山八十余年；^①再如何同德，“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隐德不耀数世”，^②接连数代山居不仕。第二类是数量众多的“征士”，也即“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③这与明初长时间大规模网罗民间人才有直接关系。征辟举荐是洪武朝官吏的主要来源，^④弘治《抚州府志》所记载的明初延揽人才的名目，竟有十五种之多。^⑤临江的众多征士里，最有名的是为《玉笥集》作过序的梁寅（1303—1389）。明太祖即位之前，梁寅被征入南京纂修礼书，“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⑥曾经负责草拟郊祀（祭天地）歌辞。^⑦礼书修成之后，梁寅以年老乞归，隐居于新喻石门山教授生徒，靖难名臣黄子澄、练子宁，以及永乐朝显宦金幼孜，都出于其门。^⑧第三类是明初被征聘出山而后弃官隐居者。明初有大量官员是在政府催逼之下被迫受职，“身虽处于庙堂之上，而心不忘乎山水之间”，^⑨眷恋山野而无心仕宦。例如周文瞻，“英声蜚扬郡县，（洪武三年）迫之以应诏”，授官承事郎、吏部主事，结果“未满岁，以老疾病告归田里”，^⑩自号“明农隐逸”。^⑪

按照传统的观点，明初文人隐遁不仕，是“当时用法之严”使然；^⑫但实际上明初士大夫安隐不出，基本上是延续了元代文人的生活状态，不能完全归咎于明初的政治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的影响，普遍抱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从汉代以来，以儒起家的士人就是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但元朝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吏治国”的时代，对儒学与儒士的压制，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以临江

① 《奉简罗源泉》《玉笥集》卷二，第 697页。

② 刘永之：《独善山房记》《刘仲修先生诗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 13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57页。

③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六，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764页。

④ 关于洪武朝的举荐制度，参看林丽月：《明初的察举（1368—1398）》《明史研究专刊》（台北）第二期。

⑤ 弘治《抚州府志》卷二十《制科》所载举荐科目计有：通经儒士、明经博学、经明行修、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怀才抱德、聪明正直、贤人君子、明经秀才、高年有德、老人、人才、能书秀才、精通书算十五类。洪武朝的举荐科目尚不止此数。

⑥ 《明史·梁寅传》卷二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7226页。

⑦ 《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卷四《乐章·告祭天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9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82页。

⑧ 正德《袁州府志》卷八《人物·黄子澄》页 14a 晏斯盛：《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96册，第 303页。

⑨ 梁寅：《藻溪记》《全元文》第 4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635页。

⑩ 梁寅：《明农轩记》《全元文》第 49册，第 633页。

⑪ 康熙：《新喻县志》卷十二《隐逸传》。

⑫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第 741页。

府为例,南宋一朝临江共有进士 236名,而元代仅有 18人,即便加上乡贡(15人,相当于明清的举人,有优先为吏的资格),也不足南宋进士数目的零头。^① 元代后期奉化文人董复礼曾经感慨当地士人为官者的稀少,称“数十年之内,(奉化)士大夫登朝廷、仕州郡者仅屈指计,较之向时(南宋)之盛,百不及一二”。^② 除了去做士大夫向来不屑的“吏”之外,元代文人入仕的途径基本被堵塞了。^③ 这种进身无路、入仕乏门的状况长期延续,结果使得士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世济民的入世理想与天下国家的宏大关怀逐渐地消泯磨灭,知识分子由渴望出仕,到习惯性地疏离政治、安于隐遁;诗文词赋与山野田园取代了功名政事,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元末的余阙(1303—1358),曾经描述仕途堵塞与元代士风变化的关系:

(元前期罢科举)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

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为也,因翱翔自放,无所求于人,已而皆无所遇。^④

元代前期即有士人因为仕宦路绝而“翱翔自放”,而延祐之后虽然重开科举,但也只是“拔一二于千百中”^⑤的门面工程,“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儒士的出路问题,士人的进取之志受到严重打击,乃至逐渐消沉。余阙曾经描绘元代后期淮南士人对田园的留恋和对科举入仕的冷漠:

(淮南)混一以来,其俗益降,民之贤者安于田亩,其下者则纷趋于末……朝廷设科以诱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应诏。^⑦

而学术与文风最盛的江南地区,士人对科举也同样漠然视之:

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南士)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⑧

由上可知,安于田里、不乐出仕,元代后期就已经是士大夫中的一种风气。明初浓重的隐逸风习,很大程度上即是沿袭前代而来;士人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也与元代一脉相承。

“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⑨ 在被动或者主动地疏远了政治、放弃了传统士大夫治平天下的事功理想之后,士人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林中泉下,聚焦于个体生命的安逸闲适,在诗文词赋之中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寄托心灵的新天地。《玉笥集》中的众多诗作,极好地体现了士大夫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变。跟以往充溢着抑郁之气的隐士诗作不同,田园隐居的安适与文人酬唱的愉悦,是《玉笥集》咏唱的两大主题。尽管作者亲历了元末的离乱动荡,除去三四首作品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之外,^⑩其余五百多首诗作对民间疾苦都无关注。从庙堂廊庑,到山林田野;从以道自任,到以文自娱;从关注社稷民生,到退守小我的心灵一隅——这是元末士人群体普遍发生的价值转变。在士大夫入世精神消退的背景下,明初不遗余力地网罗文士为官,试图将他们拉回疏离已久的政治中来,这不能不与士人疏离政治的价值取向产生严重对立。《玉笥集》卷一《白云中人为陈知县赋》就突出表现了这种国家主导的入世理念与士大夫秉持的出世取向之间的矛盾:

青山何逶迤,白云时卷舒。相看两无心,幽处真自如。斯人在岩壑,承诏升天衢。回首瞻白云,浩然赋归欤。朝与白云对,夕同白云居。飘渺落窗户,氤氲拂衣裾。云中何所

① 隆庆《临江府志》卷十《选举》。

② 董复礼:《送童敬初赴都序》《全元文》第 49 册,第 6 页。

③ 有关元代儒生入仕的途径,参看萧启庆:《元代的儒户》《东方文化》第 11 卷第 1 期。

④ 余阙:《贡泰父文集序》《全元文》第 49 册,第 181 页。

⑤ 王寔:《送刘景贤调江东宪司书吏序》《全元文》第 49 册,第 72 页。

⑥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之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82 页。

⑦ 余阙:《两伍张氏阡表》《全元文》第 49 册,第 181 页。

⑧ 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全元文》第 49 册,第 132 页。

⑨ 余阙:《贡泰父文集序》《全元文》第 49 册,第 181 页。关于元代士人的重文取向,参看徐秉渝:《从文自立——元代金华文士吴莱》《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大历史系,1996 年,第 129 页。

⑩ 卷二《兵后访西乡宗族》第 708 页;卷四《甲午岁饥民间采薇代粟》第 711 页;卷四《和周德川春夜听雨》第 714 页。

乐，所乐在琴书。常恐白云散，门外来征车。^①

“朕君天下十有三年矣，意野无遗贤，虽夙夜孜孜以求贤，贤何弗至？”^②在浓重的隐逸风气笼罩下，明初征聘民间贤良的工作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明太祖对士人不乐出仕的现象极为不解且深致不满：

朕闻昔之至智者，务志[操]以崇身，专利济以名世，未见独善其身而为智贤者。……

安有怀大才、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而恬然自处者？若必以出非其时而不仕，则仲尼

孟轲居诸侯扰攘之秋、大背于彝伦之序，而仲尼孟轲周游谒之，朕不知其何心？^③

在后人看来，洪武朝许多不可思议之举，如《大诰三编》“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札”的峻令、^④洪武二十七年对《孟子》的删削，^⑤某种意义上即是士人高卧不起与国家强制出仕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产物。钱穆谓明初文人之祸是上下之间“相激相荡”而促成，^⑥确属持平之论。

三、“只愁天遣使车迎”：邓伯言的隐逸拒仕心态

在明初大规模征辟人才的背景下，邓伯言的不少朋友或作为元朝故官，或作为民间贤良被举荐入京。《送艾录事元晖赴召》、《送刘进士允泰赴召》、《送永丰曾仲省赴召》、《送陈伯良之京》^⑦等诗即作于这种背景之下。虽然只是一名地方上小有名气的诗人，邓伯言也未能逃脱征辟。

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

邓伯言，新淦人。洪武初，宋潜溪以诗文荐之。召至京，应制赋《钟山晓寒》诗，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句，称旨，授以翰林清秩。不受，乞老归。^⑧

这则不足六十字的传记，有好几处关键性的错误，极有可能是抄自稗史笔记。^⑨根据《玉笥集》邓伯言曾两度被征。《玉笥集》卷四有诗题为“洪武壬戌夏六月，诏征天下贤良赴京擢用。雅以非才，例蒙郡举，而适婴疾病，乃恩辞。既归，辱亲故枉问，赋此为谢，并述鄙怀”，^⑩这是邓伯言第一次受召。壬戌为洪武十五年，而宋濂已于此前一年辞世，不可能有举荐邓伯言之事。《玉笥集》卷一有《圣主得贤诗》可能就是这次征辟的应命之作。“杞梓入廊庙，樗栎在林丘。作诗继雅颂，亦足赞皇猷”，^⑪诗人已明确表示无意仕途，甘为樗栎终老林丘。大约四五年之后，邓伯言再被征聘，《玉笥集》第九卷《朝京纪行》专门记述这次金陵之旅。《应制赋钟山云气沴寒诗》有句云“三《皓》比谟典，万几思始终”，^⑫《大诰三编》洪武十八年十二月颁行，邓伯言第二次朝京之行应当在洪武二十年前后。

① 《玉笥集》卷一，第 674 页。

② 朱元璋：《初诏宋讷敕符》《全明文》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844 页。

③ 朱元璋：《敕问文学之士》《全明文》第一册，第 139 页。

④ 朱元璋：《大诰三编·第十三》《全明文》第一册，第 706 页。

⑤ 参看拙作《孟子节文》事件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 年第 3 期。《孟子节文》所删除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强调士人可以傲视诸侯、守身独善的内容，这种删削与明初反对隐逸、强制知识分子出仕的政策精神一致。参看朱荣贵：《从刘三吾〈孟子节文〉论君权的限制与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中国文哲研究》第 6 期（1995 年 3 月）。

⑥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2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年，第 171 页。

⑦ 分见《玉笥集》卷四，第 714、716、724、726 页。

⑧ 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页 83a。

⑨ 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七十九：“邓伯言有《游玉笥山》诗，一联曰：‘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宋潜溪见而爱之，乃以诗人荐入京。廷试《钟山晓寒》诗，高庙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以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授翰林清秩，以老疾辞，放归山。”《续修四库全书》第 1195 册，第 17 页。又见《七修类稿》卷十二《杨邓钟山诗》。今按《玉笥集》并无《游玉笥山》诗；邓伯言第一次受徵时宋濂已歿，所谓受宋濂举荐，当系臆造；“惊死墀下”一节亦未足信。

⑩ 《玉笥集》卷四，第 723 页。

⑪ 《玉笥集》卷一，第 685 页。

⑫ 《玉笥集》卷九，第 738 页。

一名士人受到政府的多次征辟，这在明初并不少见。面对国家的频繁征召，隐士们大多心怀忧惧。“常恐白云散，门外来征车”、“自是鹿门堪隐逸，只愁天遣使车迎”，即是这种忧虑心情的写照。征召之令一旦下达，就免不了地方政府的催迫，高卧不起会有获罪的可能。洪武二十年左右的一个寒冬，作者与同时被征召的老人一起乘船，由水路赶赴金陵。《渐渝晓发》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淦水东头晓发船，邑人争看去朝天。老人星现当治平，圣主恩深被宠宣。”送别的场面相当热闹，诗人似乎也并无不快，但上路之初邓伯言就已抱定了不仕的决心：“此行得遂平生志，归课儿孙种秫田。”^①“庐阜千岩雪，鄱阳万里风。惊看白头浪，愁杀白头翁。”十二月的严寒与朔风，使得旅程颇为艰苦，而诗人所担心的不只是路途之艰险，更忧虑自己能否重归山林。长途羁旅难免使人产生身世的联想，“风涛汹涌阻行色，岁事峥嵘悲旅颜。是身安得生羽翼，飞上九天浑未难”，言辞之中包含了许多身不由己、难脱牢笼的感慨。船过陶渊明的故乡彭泽，作者写诗道：“望洋今日叹，承诏几时还。欲访陶潜宅，闻风有愧颜。”为全气节而甘于隐退的陶潜，一直是邓伯言生活和作诗学习的楷模，“愧颜”一语真实透露出这次金陵之行的无奈。到达南京之后，邓伯言如何辞掉朝廷的委任，诗中没有反映，不过按方志的说法，诗人最终告老还乡。

邓伯言是明初士人屡召不仕的典型。诗人坚持隐遁的道路，背后有多重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前面已述的元末士人安心田园、无意仕宦的价值取向。戴正心《玉笥集序》曾谓邓伯言之诗“淡泊和平而无忿 哀怨之意，盖其性情然也”，作者也多次赋诗，反复诉说自己对功名利禄没有希慕之心，“簪缨世所荣，犁锄我所安”，^②类似的诗句在《玉笥集》中随处可见。《题严氏钓隐》解释作者不仕的原因说：

尚父遇西伯，子陵辞汉光。胡为异出处，所贵安其常。……我性爱樵牧，无心慕轩裳。

为君发吟咏，有兴在沧浪。^③

吕尚与严子陵都是贤人，然而一仕一隐、出处不同。作者认为仕与隐之间没有价值的高下，出仕与否的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个人的本性，而作者无心于仕宦求名。《述先训》云：

先亲有遗训，家本积庆门。富贵非所慕，以安遗子孙。堆床积编简，绕宅置田园。世
世力耕学，余事安足论。^④

安本力学、不慕富贵，是作者的家庭自元代以来的生活传统，作者不仅自己终身践行，而且希望子孙也能守之弗坠。“平生寡嗜欲，所好在吟诗”，^⑤除去耕读，和元代多数士人一样，邓伯言在诗文之中找到了寄托襟怀的天地。田亩躬耕可以足衣食、山林游乐可以怡身心、诗文唱和可以寄精神，诗人已经在仕宦之外找到了一个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自足的世界。田园生活的恬适，已经消解了入世立功的雄心，安居林下是诗人主动的生活选择，其中没有被迫的因素。

其次，邓伯言坚卧不出，也与他的遗民立场有一定关系。邓伯言在元末度过了青年时代，并且受过较好的理学教育，贞节与忠君的观念不能对他无所影响。因此虽然是未食元俸的一介布衣，诗人心中仍不免有遗民情节。《拟古九首》之三咏赞义不仕周的伯夷、叔齐道：

夷齐圣之清，天地钟间气。仁哉让国心，忠矣谏伐意。首阳虽饿死，万古终无愧。俯
仰怀高风，吁嗟劝来世。^⑥

这首诗不能确定是否作于入明之后，但从中可知作者忠贞节义观念之重。在为当地另一名隐士所作的《题何同德独善斋》中，作者再次提到进退与义的关系云：“独善匪傲世，舍义将焉从”，将是否

^① 《玉笥集》卷九，第 738 页。

^② 《喜雨二首》《玉笥集》卷一，第 680 页。

^③ 《玉笥集》卷一，第 684 页。

^④ 《玉笥集》卷一，第 671 页。

^⑤ 《偶题》《玉笥集》卷一，第 687 页。

^⑥ 《玉笥集》卷一，第 689 页。

合“义”作为仕止的标准。入明之后，与诗人一同隐居玉笥山的艾元晖被征入京，邓伯言作诗相赠：

玉笥山中采药苗，金陵台上有书招。夷齐守义慚周粟，贾董怀才入汉朝。^①

“贾董”指西汉名臣贾谊和董仲舒，这里比喻艾元晖，既然怀才便不当埋没，似有为友人被迫出山宽解之意；“夷齐”则显然是隐居玉笥山中的作者的自喻。而在《和何克敬春行》中，作者更直接地以胜国遗民自居，所谓“渔钓昔闻周隐士，讴吟今作汉遗民”。^②《玉笥集》最末一卷《朝京记行》特以《安庆吊青阳先生余廷心》作结，其中似乎包含深意。余廷心即余阙，元季为朝廷战死于安庆，明太祖特令立庙奉祀。“青阳先生不可见，群玉山人（诗人之号）空复情。一门骨肉死贞节，千古文章留姓名”，^③邓伯言以本诗作为诗集的结尾，似乎意在借此委婉地表露自己的遗民心曲。

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了坚持不仕二朝的遗民底线之外，邓伯言对新建立的明朝并无敌视态度。《玉笥集》中有不少颂美新朝之作，虽然有一些诗歌（如受召应制诗）属于应景之作，但从一些私人唱和的作品中，还是能够看出作者对明朝的真实态度。比如《题李氏维稼堂》“唐虞致雍熙，巢许乐幽独”；《丰年》“豳风世已远，王业今复隆”；《题李如愚环山亭子》“当今天子开治平”；^④在这种私人吟咏与隐士之间的唱和，没有必要故作颂圣之语。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安定，使得诗人对于朱明政权怀有好感。这不仅反映在作者一人身上，许多在明初不仕的隐士同样如此。譬如为《玉笥集》作序的何淑，作为元代的进士，他也曾屡次力辞征辟，^⑤但在序文（洪武八年作）中却谓邓伯言之诗将“宣宫商、谐金石以鸣国家之盛”，^⑥言语之中也透露出对明政权的好感与期许。

除去这种温和的遗民心态，明初政治环境的严苛，也可能是邓伯言屡辞不仕的原因。“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⑦明太祖对元季政事苟且、官吏腐化深恶痛绝，不惜用矫枉过正的手段严加绳治。明初对官吏约束管制之严，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空前之例，官吏稍有不慎就罹于刑宪。^⑧在征召民间人才的大潮中，诗人的许多朋友被迫出仕，其中即有因过失而被迁谪乃至治罪者。新淦人谢叔宾授官北平检校，因过失“左迁广东仁化县幕职，复以朝贺后期，谪云南安置”，^⑨诗人为此曾两度作诗相寄；黄子律征授上海县令，不久被罚徒役，后来遇赦还乡，死于中途。邓伯言作诗哀悼，前有长序云：

子律名钟，吉之永丰人也。……洪武癸亥春（十六年，1383）以贤良征至京师，授上海令。上海地广赋多，民嚣于讼，称为难治。君至，平弊政、施恩威，民皆悦之。既而以罪去官，执法者令服徒役，未几遇赦免。君望阙谢，买舟南归，因中暑暴病，歿于清江之境。^⑩作为一名贤良官员却未能得以善终，足见明初之为官不易。“廉勤恒自守，始终竟莫保”，诗人为友人之死颇感不平。元末明初的士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热情，这种约束严厉、动辄获罪的政治环境，更使得文人士大夫畏惧退缩。而邓伯言再三以老病推托不出，其中应当也有借鉴前车、避祸自保的考虑。

① 《送艾录事元晖赴召》《玉笥集》卷四，第714页。

② 《玉笥集》卷四，第713页。

③ 《玉笥集》卷九，第741页。

④ 分见《玉笥集》卷一，第675、691页；卷二，第694页。

⑤ 弘治《杭州志》卷二十三《人物三·乡贤》“何淑……登进士第，授武冈丞，蕲沔盗起，不果上。洪武辛亥（4年），召为太子宾客，辞不就。六月，特招天下名士九人，淑居首。至京固以老疾辞归，戊辰（21年）春，复遣币征。适蜀王亦来招，淑已先一月捐馆，两使相叹息而去。”

⑥ 何淑：《玉笥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669页。

⑦ 洪武四年朱元璋与刘基书，《诚意伯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⑧ 隆庆《临江府志》载洪武十八年练子宁殿试对策论明太祖用人之过：“今则不然，以小善而遽进之，以小过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才生之甚难，成之尤难；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为难，又岂忍以区区小故而即付于刀锯斧钺之地哉？”明初官员易于得罪，固与法禁严厉有关，另外士人多以文名受聘，并不熟悉政务（练子宁所谓任人“循名而不求实”），这也是易于获罪的原因。《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忠节传·练子宁》页57a-b。

⑨ 《玉笥集》卷一，第683页。

⑩ 《做上海令黄子律哀诗》《玉笥集》卷一，第682页。

四、小结

元末明初临江诗人邓伯言的《玉笥集》为我们揭示了临江府新淦地区周围存在的一个庞大的隐士团体，是元明之际盛行的隐逸风尚的一个缩影。明初隐士群体的大量存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并不能单纯归因于洪武朝的政治环境。其中最主要、也是对整个明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应当是自元代以来士人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蒙元的统治对儒学与儒士压制了接近一百年的时间，政治上进取无门，直接导致士大夫参政热情的消退，士人的价值认同由庙堂转到了山林，由兼济天下变为独善其身。^① 不求仕宦、隐遁山林，很大程度上是士人元代生活方式在明初的延续。明初国家主导的积极入世观念，与士人坚持的退隐独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洪武朝对文人士大夫的严厉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这种价值观念冲突的结果。由于理学思想的传播，忠贞节义的观念对元末士大夫有较深的影响，明初不少士人隐遁不出，有着遗民立场的背景。^② 不过就《玉笥集》中所见的事例而言，除去坚持不仕新朝的底线之外，遗民隐士对朱明政权并无恶感。另外，传统政治史一贯强调的明初皇权专制的加强与明太祖对官吏的严厉绳治，也是士大夫望仕途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中，元代以来士人价值观念由入世到倾向于出世的巨大转变，乃是形成明初隐逸之风的主因。

The Reclusive Tendency in the Early Ming Elites: A Case Study of *Yu Si Ji*

ZHANG Jia-j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Reclusive groups flourish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period. In traditional view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clusive fashion in the elites was due to the autocracy of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concerning a hemi's anthology *Yu Si Ji*, and tries to argue that it was the change of values among the elites in the Yuan Dynasty that mainly caused the hemi phenomenon which lasted till the early Ming. The autocracy in Hongwu reign-period was resulted from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elites and the authority.

Key words elite, hemi, early Ming politics

[责任编辑 陈文彬]

① 这种价值转变对明代儒学影响极为深刻，明代前期的大儒从吴与弼到陈献章，强调的都是个体心灵的修养与体验，传统儒学事功的面向基本被忽略了。钱穆先生最早指出，在精神层面上他们仍是“元代之儒”。

② 这点在婺州隐士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参看唐朝晖：《元婺州遗民诗人群体及其文化特征》《求索》2004年第7期。